文章编号: 1005-0523(2009)02-0120-05

镜花水月女儿国

——论《镜花缘》进步的女性观

罗尚荣, 朱菲菲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镜花缘》是一部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 作者在小说中大胆地突破封建礼教的规定, 倾情地描写了各类女性的杰出才能及其大胆的行为, 表现了其进步的女性观。从男女角色地位、社会活动范围等方面来探讨了书中才女是怎样摆脱了封建束缚, 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并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实现了个人价值的, 充分体现了作者难能可贵而又进步的妇女观。

关键词:才女; 社会角色; 活动范围; 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 女性被束缚在家庭里, 按照男性的需求在深宅后院做贤妻良母, 而在家庭里却像工具一样没有任何地位, 被男性或者说男性代表的社会文化任意驱使、压迫着。反映在文学作品中, 女性就像符号一样存在着, 没有自我意识。但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 特别是明清时期, 由于个性解放、肯定人欲等思潮的兴起, 文学创作领域也进行思想解放, 开始慢慢地观照人性, 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也一步步攀升, 如李汝珍《镜花缘》中“金玉其质”且“冰雪为心”的百位才女。作者不仅描写这些女性的胆识贤智、才能技艺, 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女性置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予以观照, 多方面的表现女性的各种才能。这是作者对女性的肯定和赞赏, 也是作者妇女解放思想意识的体现, 与前一时期《西游记》、《红楼梦》里“女儿国”相比, 作者既承袭了吴承恩、曹雪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又是三者中对女性问题剖析得最全面、最深刻的。

1 突破固有的男女角色定位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 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 把女性束缚在深宅后院, 父系文化意识耳濡目染的渗透, 使女性安于社会指定的卑贱地位, 慢慢地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自我意识, 从而一步步淡出社会领域, 走到社会制度的边缘, 成为男性的附庸。男性又利用其已经具有的绝对话语权, 制定了许多道德教条, 并强制性地规定了各种女性角色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心理, 这就更加深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思想与行为的控制。“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是中国古代男权文化对女性道德行为要求的一个概括性总结。中文的“女”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跪着的人形, 而“妇”字的解释是: “妇, 服也, 从女持帚洒扫也”。女性角色被封闭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单位之中, “女性和男性从呱呱坠落开始, 就已经在外部环境的诱导下, 分别体验着自己的性别角色。这种无处不在的父系文化观念成批地制造着符合男性社会标准的女性”^[1]。也就是说, 传统男权文化给女性角色的定位使得女性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做男性

收稿日期: 2008-11-20

作者简介: 罗尚荣 (1968-), 女, 湖南长沙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

的附庸。

由于传统主流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控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也多是暗合社会或者说暗合男性作者的需要。然而在《镜花缘》中,作者的思想具有前瞻性,他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想范式的女儿国。与《西游记》相比,从男女角色的变化来看,《镜花缘》作者的女性观更进步。《西游记》里西梁女国“那里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尽是妇女”,在这个王国里,“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女性可走出深宅后院,串街走巷,可为农、为士、为工、为商。虽然《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不直接地抒写现实的生活,但作者能够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明朝主观上塑造出女儿国这一国度实在难能可贵。而《镜花缘》里的女儿国,正如胡适所评“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的不朽的文学。”^[2]在这个国度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这里的女儿国和《西游记》里的女儿国一样都是女性处于统治地位,女性掌握着上上下下的权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她们像传统社会里的男人一样承载着社会的重担。但此女儿国非彼女儿国,两者相比,《镜花缘》里的女儿国才是名副其实的女儿国。这里“女权”颠覆了“男权”,男尊女卑变成了女尊男卑。女子摆脱了一切的束缚和限制,可以扬眉吐气、意气昂扬地走在男子面前,以高姿态俯视男子,并可以实施男权社会里赋予男子的一切特权,让男子经受男权社会里女性所受的一切苦难。这里的男权主义已荡然无存,男子成为女性的附庸,这里的男女角色是被倒置的,男的“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不仅一副妇人打扮,还“在那里绣花”,真是人世鲜有,以至于唐敖和多九公戏称那些有胡须的“妇人”为“人髻”、“墨猪”。长得面皮白净的林之洋则在这女儿国里被国王选为“王妃”,他的角色也转为女性,要依照国王的审美要求被穿耳、缠足等。而《西游记》里女儿国中的女性当权则是由于男性的缺失形成的,女性迫不得已地成为统治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有男性出现,“娇娥满路呼人种,幼妇盈街接粉郎”,女国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西游记》的女儿国里一旦出现男性,便由男性“坐南面称孤”,由此可见,这里不是真正的女权国家,女性只是以一个代理者的身份来执掌国家。“女性分担男性的责任,对女性本人来说,常常是一次迫不得已的选择。完成使命以后,仍要回归本来的自己,很少会留在男性的领域里与男性分庭抗礼”^[3],这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对比来看,《镜花缘》里的女性做着传统男权社会里男性能做的一切,而且她们比《西游记》女儿国真正进步的地方在于,这并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不存在男性角色缺失的问题,她们是真正地掌握了主动权,能够实现自己的欲望,有主宰自己的能力。这里的女性打破了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摆脱了男性中心对女性的规范以及女性对这种规范意识的自我内化和自律。由此可见,李汝珍是采用了《西游记》里女儿国女人当权的模式,让女性真正当权,来体现他对女性的肯定,以及他对男权主义的挑战。

2 扩大了女性活动范围

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的一举一动都被严格的限制在封建伦理道德中。数千年的封建文化要求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并对其活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即“莫窥外壁,莫出外庭”,这就断绝了女性与外界的联系,这样她们的一生都掌握在男性手中。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女性形象的模糊和地位的低下,而在《红楼梦》和《镜花缘》中,作者对女性倾注了无比的热情,曹雪芹和李汝珍以“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和卞园为舞台来塑造超尘脱俗、才华横溢的女子形象。

《红楼梦》里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被看作是天地间的灵气所钟,是生命的精华。作者突破才子佳人小说描写女性的窠臼,意在塑造一群超凡的女性,如才貌双全的黛玉、德才兼备的宝钗、阔达豪放的湘云、柔弱和顺的迎春、聪慧果敢的探春、胆大泼辣的熙凤、美丽率真的晴雯、高洁脱俗的妙玉等,作者安排她们在世外桃园似的大观园里应和唱答、尽显才情。这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感人至深,令人难忘。卞园里也是才女云集,她们和大观园里的女性一样博学多才,诗词曲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且还有不少人通晓

经史音韵、医学算术、天文地理等实用学问,如:米兰芬精通圆周率,而且对差分法、雉兔同笼等算术有精到的研究,能计算卜府大小灯球,她还精通光速和音速,能推算出雷程的远近。其他如师兰言精于风鉴,燕紫琼精于茶经等等。还有一些能文能武的,如骆红蕖操练武艺,魏紫樱狩猎养家、保境安民,颜紫绡“谪剑侠之术”等等,她们文才、胆识兼备,比之那些深藏的闺阁中的女性多了一种阳刚之气。作者不仅像《红楼梦》一样表现女性的才能,还把她们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让这些女性脱离传统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定位,走向社会,她们学习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掌握些闺阁闲技,也不是为了“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汤显祖《牡丹亭》)而是为了参加科考、参与政事、建功立业。这是李汝珍对曹雪芹塑造女性形象的扬弃。大观园里的女性在男权束缚与她们要求超越束缚的夹缝中生存,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与社会地位,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天然的依附性,她们生存的“理想国”——大观园和封建社会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们没有摆脱“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结局。而《镜花缘》里的女性不再是足不出户的佳人形象,她们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中,参与社会活动,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耐利用有实用价值的学识技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摆脱了附庸男性的处境,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如才女们借助科举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阴若花做了女儿国的国王,枝兰香、红红、亭亭做为辅政大臣,她们将国家大事看做自己的事业,并同心协力主管政事。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也使得女性可以在参与国家的政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在其他的作品中没有看到的新视角。李汝珍塑造百名才女的目的正是“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就是为数千年备遭埋没而玉质冰心的女子立传。作者在《镜花缘》里塑造的百名才女就是为了张扬女性自主,提倡男女平等,是其全面解放女性思想的体现,是其先进的妇女解放意识的张扬。正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做的结论一样:“《镜花缘》表现出对妇女地位、境遇的关注和思考。作者针对现实世界的‘男尊女卑’,一方面借百花仙女下凡写出了一大批超群的女子……男子之能事,她们也能做到,这是以表彰才女的方式,表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4]曹雪芹笔下的女性“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是封建压迫造成的,作者写《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美的被毁灭的悲剧,意在提示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即让人警醒、反思封建社会的文化制度。李汝珍笔下的《镜花园》则是在《红楼梦》的高度上更上一层楼,以百位才女女性意识在社会领域里的延伸来倡导女性摆脱男权束缚。

李汝珍笔下的百位才女个个胆识过人,才能技艺不输须眉,她们的个人素养修为超越闺阁闲技,掌握更多了实用性技能,并能利用这些技能在广阔的社会领域找到自己独立的价值,实现了人格的独立,摆脱了男性附庸的屈辱地位。可以说,李汝珍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才女形象群体,正如学者张蕊青所说:“《镜花缘》中的女子,已不是传统小说中爱情主角或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她们有自身独具的存在价值,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李汝珍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已经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5]这些才女形象比之《西游记》、《红楼梦》具有更广的社会内容和意义,女性解放意识更强烈。由此可见,李汝珍的《镜花缘》所反映的女性问题较之前人更进了一步。

3 作者进步女性观的成因探析

《镜花缘》体现出高出时代思想的先进女性观不是偶然的。

首先,“激流勇现”的时代思潮给予了作者进步的思想。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动摇着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思想上张扬个性解放的思潮越来越强。李汝珍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对“存天理,灭人欲”,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提倡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如徐渭、李贽等,他们的民主解放思想影响并引导着社会思想潮流的发展。女性作为社会的“半边天”,如逢甘露,竞相苏醒,她们有了挣脱封建束缚的强烈愿望,即使清朝是封建社会中礼教最为完善的时代,对妇女的束缚的限制也是最严酷的一个时期,有关妇女的生活准则、道德准则甚至形成了宗教化倾向,然而苏醒的女性在社会夹缝中奋力求生。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突围中,作家群

体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体裁取舍的角度逐渐将目光转向从未关注的女性,一些有识之士,则勇于大胆的承认女性才情,开始关注女性解放问题。如袁枚冲破男女之别,广招女弟子。李汝珍生活在这一时期,必然会受到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反映在《镜花缘》中就是他对女性问题的特别关注。正如胡适所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妇女问题,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这是《镜花缘》的主旨。”^[6]作者正是通过写百位才女摆脱封建束缚,突破传统的男女角色定位,成为社会积极的参与者,并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实现个人人生价值就女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李汝珍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具有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显露了初步的时代气息。”^[7]

其次,历代探讨女性问题思想的积累和发展。女性问题的提出不是李汝珍开启的第一页,在早期作品中就有作者对女性问题有所触及。如《三国演义》中出现了勇于为政治献身的貂蝉、嫉恶如仇的徐庶母、以身殉国的马邈妻;《水浒传》中有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等可以领兵作战的女英雄。这些女性形象在书中虽然不是很饱满、生动,但至少她们代表着文学作品中作者开始了对女性关注,她们开始有了独立的存在价值。《西游记》和《红楼梦》对于女性问题的探讨则比前面作品更多深入,女性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并熠熠生辉。而李汝珍则从女性关怀的角度,吸取了吴承恩《西游记》中对理想女儿国的构筑,也吸取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有才干的女性命运问题的思考,李汝珍在《镜花缘》第一回中就借泣红亭主人所写的碑传传达了自己著书的目的:“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专之。”由此可见,李汝珍创作目的是为天下女性立传,他在《镜花缘》中塑造了博学多才,有实用技能,具有男儿胆识和贤智,且有独立人格能参与政事的百位才女。比《西游记》和《红楼梦》更为深刻的是,“《镜花缘》则用理性思维提出了拯救女子的办法”^[8],李汝珍开始关注广大女性的出路问题,他希冀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能像《镜花缘》中的“金玉其质”、“冰雪为心”的百位才女一样,冲破传统男权文化的束缚的藩篱,挣脱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的困苦,能够找到自己在社会独立的价值定位,脱离对男性的依存关系,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正是在前期作品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的基础上,李汝珍塑造了百位才女,并将她们置于比内在心灵和外在家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加以观照,多层次、多方面的体现这些女性的才能,使得这些女性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的有意识地追求男女平等,试图打破女性处在男人附庸地位的社会角色的限制,意欲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强烈愿望。

4 结语

《镜花缘》提倡女性受教育,不以女性言政为非,还主张女性参加科举,参与政治的思想是比前时期的作者们有了较大进步,是其先进女性观体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作品中还是存在男性话语权,如李汝珍在开篇就述说了他品鉴女子的标准是儒家的女教经典是宣扬“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女戒》,而到了篇末,百位才女经历了聚会游玩的一番热闹后,依然是回归家庭,重复着传统女性走的老路。作者笔下的这些女性最终并没有跳出封建束缚的藩篱,由此可见植根在作者内心深处的儒学传统,这是作者内心深处无法抹去的封建社会文化烙印。

虽然李汝珍并不能完全超越时代赋予他的局限性,但是瑕不掩瑜,他对封建时代女性命运的独特思考,体现了其试图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支配一切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李汝珍以其先进的女性观构建了当时社会的女性理想,《镜花缘》则反映了李汝珍对封建时代女性命运问题的反思,使得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镜花缘》得以独步于其时文坛并享誉后世的真正原因”^[9]。

参考文献:

[1] 孙绍先. 女性主义文学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95.

[2] 胡适. 胡适文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67.

- [3] 朱易安, 柏桦. 女性与社会性别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51.
- [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404.
- [5] 张蕊青. 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 [J]. 北京大学学报, 1999, 36(5): 103—107.
- [6] 胡适.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79. 531.
- [7] 刘保忠.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女性观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6, (9): 122—125.
- [8] 毛忠贤. 《镜花缘》对《红楼梦》女性问题的反思 [J]. 文史知识, 1989, (11): 59—62.
- [9] 段启明, 汪龙麟. 清代文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535.

An Illusion Daughter State

LUO Shang-rong ZHU Fei-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Jing Hua Yuan*, whose author boldly breaks through the feudal ethical code in the novel, is a work which reflects the lives of women.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perfect talent and bold behavior of various types of women, showing his progressive view on women.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ole and status of male and female and social activity territory, we discuss how these women break away from feudalism, tie to become aspiring participants in society, and realize their individual value in society, revealing the author's valuable and progressive view on women.

Key words: talent women; social role; activity territory;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责任编辑: 王建华)